

# 古书版本鉴定漫谈

国家图书馆 李致忠

将版本鉴定的内容压缩到一次讲座中来讲，我觉得非常难。而且作为读书沙龙，应该是以座谈为主，所以，我在讲完后想留下点时间和大家做互动交流。

“古书版本鉴定”是一种习惯的说法，我个人认为用这个词不太合适，但又没有更合适的词语，国家鉴定委员会讨论多次还是只能用这个词。大家知道，“鉴”是一种器皿，在没有青铜器的时候，它是用陶器烧制而成，里面放水可以照影。有了青铜器之后，它变为铜器的一种，也是放水后可以照到自己的形象，看看是否合乎礼仪，后来才有了铜镜。所以，“鉴”字有透过透明的东西鉴别物件真伪好坏的意思。拿到古书版本鉴定中来说，这个意义也用了好多年。它是以眼睛作为“鉴”，来加以鉴别评定，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凭眼睛就可以鉴定出来。实质上，我想在座的先生们不会认同这种浅俗化的理解。就算是洪亮吉所说的那些“眼别真贋，心识古今”的鉴赏家也做不到这点。

这类鉴赏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黄丕烈了，黄丕烈也做不到。我觉得，黄丕烈值得研究，但评价不能高。在古书这一行早先有种说法，有“黄跋顾校”的书身份都很高。黄丕烈的贡献在于，他以个人之力搜集收藏了很多好版本的书，而且每收一书，都要把收书经过乃至花了多少钱做详细记录。他的题跋多数偏重于这一方面，介绍这个书曾经由谁收藏过、他在哪儿见过没有得到、后来又如何得到的经过，除此之外，没有更深的介绍。我们现在正在写《中华再造善本》的提要，需要很多很多清代藏书家的藏书目。譬如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滂喜斋的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黄丕烈及顾千里等一系列清朝中期往后一批藏书家的藏书目，到近晚期的如海源阁的《楹书隅录》、铁琴铜剑楼的藏书目录等等，一直要用到傅增湘先生的《藏园群书题录》、《藏园群书经眼录》，乃至张元济先生的《涵芬楼烬余书录》，还有《宝礼堂宋本书录》。看来看去用来用去，各有特点，比如张金吾对所藏书不多说什么，但他的特点是将所藏书上的序跋全文抄录到书目上，这对我们是很有用的。因为如果书的序没有了，就不知道这本书的来历，而靠他书目中抄录的序就可以了解了。真真正正讲学问的，能讲出这本书的刻印年代和刻书地的，我还是推崇张元济先生和傅增湘先生。这两位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又有新的做学问的方法，所以他们的书目特别值得重视。

我们通常说的鉴定，大家切不可把它理解为有人有种本事凭眼睛就能看出书的真伪。可能有的书是这样，通过研究这本书，找到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比如通过某一个字来区分、鉴

别。如果说单纯凭眼睛来鉴别，那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不要相信这种说法。古书鉴定本来是从做学问中派生出来的一门学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辅助性手段。它是一门学问，主要是靠考订，当然也需要鉴别。材料都搜集好了，要下结论时，就需要靠平时积累的经验通过表面的风格特点来做出判断，这时需要鉴定这一概念。

近几年，收藏是一股热潮，其中包括版本书。相比古玩玉器，版本书较少较冷，真正的好版本都已经是登录在案的。所以，开头讲这些是想告诉大家，不要相信凭眼睛就能鉴定版本的说法，对鉴定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辞书中对鉴定的解释是鉴别评定，通过鉴别的方法来评定出书的优劣真伪。这个解释本身没有毛病，但这不是说仅仅凭眼睛就能解决，应该将凭眼睛看和通过文献资料考订结合起来，“鉴定”应该包含鉴别和考订两个含义。在座的朋友如果也想参与现在的收藏热，还是要凭学识来判定。

这是我要交代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那是不是说眼力和经验就不需要了呢？不是，这是基本功。不能拿它当唯一的科学的方法，但又不能缺少它。假定去考证一批书，除了能带一些书本目录，没有什么可以借助的。这时，经验和眼力就很重要了。再比如我们在编目过程中要给某个版本下结论时，光有文献的证据，没有实践经验的判别也不行。大家知道李太白的集子是宋蜀刻本，是蜀刻唐人文集中的一种，是十二行本系统的一种。到康熙时缪曰芑影刻这部书时，不仅是行款、字体一样，连宋代的刻工都影刻下来了。这就很容易让人将其误认为是宋刻本。但如果凭借经验和眼力就能发现，再怎么造假，纸是没法造假的，康熙时没有宋代蜀刻的用纸。所以，这时就需要用经验和眼力判断。经验和眼力的练就，一方面需要多看，另一方面还要学习前人归纳的相关版本知识。当然，前人归纳出的版本的风格特点说不上是百分之百正确，准确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十就不错。

—

下面我首先介绍一下各时期版本的风格特点，在做古书鉴定时可以用作参考。

### （一）宋代刻书

南宋时期，江西、福建、四川、浙江各地的刻书风格各不相同。严格的说，杭州地区和明州地区的风格也不完全一样，明州地区和婺州地区也不完全一样。再详细地说，江苏这一带也能再细分。这些不同之处中最重要的是字体风格不一样。发达地区刻书有很多书手，即写字的匠人，这是专门的一种功夫，写出专门的一种字。一个地区写得最好者能形成一种影响源，影响整个地区，形成一种特征，这些特征靠积累可以区别出来。比如说四川刻的书不

能说都是颜体字，但它确实是模仿颜体字的居多。比较厚重，现在看来有些笨拙，但实际上很古朴。福建刻书是另一种风格，主要是学柳公权，傅增湘先生曾说过福建刻书棱角俏丽。江西刻书风格又不太一样。我佩服傅增湘先生能在众多书中断定哪个是江西本子。

如果能把四川、江西、福建几处刻书风格记在脑子里，拿到一部书就可以先用排除法来辨别。如果排除是这几处的刻书，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江苏地区的刻书，江苏当时还包括安庆和徽州，即现在的安徽。这样的分辨能力不算学问，但这是基本功。

## （二）元代刻书

我将元代版本的特点归纳为八个字：黑口、赵字、多简、无讳。所谓黑口，元代刻书大黑口者多，官私刻书都是如此。宋朝刻书白口居多，这是讲究。南宋后期出现了线黑口，就是细黑口。到了元代就给铺陈夸张为大黑口了，书口处留一块木头不刻是为了省事。

赵字，即仿赵孟頫的字。随着元朝政权的巩固，招贤纳士的工作做了很多，赵孟頫就是被招纳而来的。赵孟頫是宋代的宗室，投降了蒙古人，在正统思想中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他的字历来被认为带有媚气。实际上，赵字的价值，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中是真正的集大成者，影响了元朝一代，不少刻书者都模仿他的字，这些都是事实。元代的刻书，特别是书院刻书和官刻虽不敢说都是赵孟頫的字，但大体上是学赵字。

多简，是多用简体字、俗体字、异体字，这一点在书铺刻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笔画少，结构简单，刻的时候既省事又省成本。我们把这些归纳出来，也可以成为辨别版本的一个证据。我们的再造善本选了不少南宋到元朝这段时期中建安建阳书铺整理刊刻的书，有些书没有编纂者，书铺或者找人编，或者自己编，然后刊刻出来，如何判断出是书铺子刻的呢？其中简体字、俗体字、异体字多就是一个标志。

无讳，即刻书时几乎没有讳字。元朝也有避讳，就是写书刻书时用字只要与皇帝的名字不完全一样就可以。蒙古人的名字很长，又是音译，所以，书中用字与皇帝的名字完全一样的情况几乎没有。

## （三）明代刻书

明代刻书的风格特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成化以前是一个阶段、正德到隆庆是一个阶段、万历以后是一个阶段。

明代前期刻书仍然是黑口，但更为夸张。明代内府刻书，开本大，我们形容它是开本宏朗，用纸好，仍然是大黑口。朝代交替初期，刻书风格变化不大，所以，这时候最容易混，也最容易造假。元初刻书充宋刻，明初刻书充元刻，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正德到隆庆又是一个阶段，这是一个风格发生极大转换的时期。中国古籍现在要制定古

籍定级标准，我的意见是明洪武元年到隆庆六年这一段的古籍定为二级。为什么？嘉靖一朝是明朝历史上变动很大的时期，明朝复古运动起于正德后期，于是整个影响到嘉靖一朝。所谓文学史上的复古运动，实质是打破明前期达官显宦把握文坛的死气沉沉的局面。文学史上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这虽然是文学史上的现象，但实际上影响了整个社会思潮。刻书也受到影响，刻书复古主要是复宋代之古。嘉靖一朝的刻书特点是最明显的，全国各地的刻书，远至广西，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字体都是横轻竖重，方方正正的，所谓的仿宋字就是这个时期出来的。直到隆庆六年还延续了这一余风。所以，我主张古籍的二级标准应划到隆庆六年。日本人划到正德，我不同意。

万历元年直到康熙六年又是一段。万历初期，经济上有一段小复兴。社会经济得到了一些恢复。此时的刻书，开本宏大，字体疏朗。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出现了变化。到了万历后期，为了省纸节约成本，行变密字变瘦，所谓狭行密字，这是社会经济萧条的表现。可见，社会经济变化对刻书是有很大影响的。

明代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明代的藩府刻书。明代的藩王是很有势力的，藩王受封后都要去封地，藩王之国与否从西汉吴楚七国之乱后成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朱洪武总结历史经验，规定所有封王都要到封地去，但同时他有几项措施：第一，给每个王爷派一位高僧大德，劝善，别弑杀，别关心政治。第二，送书，尤其用文学作品陶冶性情。明朝有很多王爷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藩府刻书是明朝特有的文化现象，因为有经济实力，跟书铺刻书目的不同，是为了烘托学术，而不同于书铺要努力降低成本，所以，藩府刻书的印纸刻书都很讲究。具体特点我就在这里不详细说了。

## 二

虽说不能只靠眼睛来判断版本，但这个基本功又不能没有，以上我讲了一些判定版本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还是主要要靠考订来辨别版本。比如中华再造善本中选了一个《礼记》二十卷，是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的。当年抚州公使库刻《礼记》时还刻了一部唐朝陆德明的《礼记释文》四卷。《礼记释文》和《礼记》两部书早就散落开了，到了我们馆里是按照两部书来处理的。但顾千里在跋文中说在《礼记》书后原本有七行校正官的衔名和年月，但装订时却装在了《礼记释文》的前面了，装错地方了。现在这两部书都在国家图书馆，但两部书中都没有找到，显然这一版本证据失传了。只能再从别的角度考订，在顾千里的跋文中还有一句话，说张敦仁曾经影刻过这部书，于是，去查这部影刻的书，会发现影刻时这纸衔

文还在，所以，可以把这两部书定为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如果凭眼力，可以判断出这是宋刻本，顶多可以说出是江西刻本，更详细的信息如果不经过考证是说不出来的。

考订的途径有很多。下面简单介绍几种。

（一）讳字。唐宋的避讳已经很严格了，宋朝人避讳大部分用缺笔讳，也有用改字讳，这个很难发现。通过讳字来考订，一定要找到位，比如说书中发现“构”字避讳就断定是宋高宗时刻本，这是不行的，还要继续看跟“慎”字、“愷”字有关的字是否避讳，如果“愷”字及跟“愷”字有关的所有衔名没避讳，“慎”字有避讳，就能下结论是孝宗朝刻本。所以，要找到避讳字的下限。

南宋刻书有点特殊的现象，南宋初期国事较好，经济出现中兴局面，避讳比较严格。“高、孝、光、宁”几帝，避讳都比较严格。到理宗时，颁布《礼部韵略》，公布皇帝的御名及其衔名的讳。考进士、写策文都不能犯讳，犯讳等于犯法，所以，刻书家出版家写书样时也要注意回避。尤其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讳是赵桓的“桓”字，明宗以前刻的书遇到“桓”字和与“桓”字相关的衔名字通通都避。理宗以后已是南宋衰落之时，所以避讳就不那么严格了，这时再拿讳字作为考订的途径就不行了。

有些元初刻本也有避讳，这是好多刻书家出版家从南宋遗留下的习惯。所以，这时不能就因此断定是宋刻本，要灵活运用。

（二）刻工。研究刻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好多书铺刻书都没有刻工。带刻工较多的是官刻，包括书院、儒学、公使库的刻书。因为是官刻，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一页谁刻的，要负责任。而且，以此计算工资。我们也见到过，改正刻错的字也会署名。所以，刻工制度其实就是责任制，这种制度能给我们留下当年的痕迹。宋朝人大体上能活到五十六七岁，比如一个人做一辈子刻工，从十八九岁开始刻书大概也就是三十几年。假定某个刻工在一部有具体年款的书中出现了，在另一部书中也出现这个刻工，我们就可以大体确定这部书刻的时期。刻工都隶属于不同地区，常常是家族式的。当然杭州地区刻工刻的书不一定是杭州地区出版的，因为刻工可以来回游动，尤其在两浙东路这一带，往东一水之隔就是绍兴，再往东就是四明（现在的宁波），这些都是刻书发达的地区。刻工也是一个进行考证的方面，但也必须活用，一方面，会有重名的。另一方面，就是刻工能来回游动。

（三）刻书牌记。牌记一般是牌子的形状，里边记录刻书的缘起和目的。也称刻书本记或者叫条记。如果没有人造假，这就是很重要的证据。用这个方法时，要注意是否有人造假。有的是造一个假的牌记，有的是将牌记挖去。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早先是宝礼堂的藏书，张元济先生在《宝礼堂宋本书录》中注录是宋本书，到我们

馆时我们也沿用了这一注录。没想到，在文革时，山东的鲁荒王朱檀墓开发时出了几种书，其中就有这部，这部书拿到我们馆里修时，在卷三十中发现有墓记“至元丁亥武夷詹光祖重刊于月崖书堂”。再看我们的书中卷三十后边被割去了半页。武夷詹光祖是跨宋元两朝的人，割去这半页为了让这部书变成宋版。这是一个例子。再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詹光祖刻过，我馆注录为“宋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全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注录为“至元二十四年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刻本”。至元二十四年就是至元丁亥，可以证明詹光祖到了元朝初年还在继续刻书，而且这一年不仅完成了《杜工部诗史》一部书，还有这部《资治通鉴纲目》。把这两部书拿来一对比，风格都一样。所以，这种考证就说明能下手的线索都要运用。

我在一部书中归纳了十五种考证的渠道，如果谁的知识更丰富，还能归纳出十六种十七种。知识越丰富，下手的地方越多。比方说地名，地名经常变化，也可以当做一条线索。以北京而论，元朝时叫大都，大都以前金朝人在时叫中都，再往前的辽代时叫燕京。朱洪武立朝后，改称北平府。然后，朱棣从这里起兵，经过天津到南京做了皇帝，觉得此处顺天应人，于是永乐元年改称顺天府。

官名也是有变化的，历朝的官名也不完全一样。比如看到参知政事，下边一定跟着一个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掌握一些直观的知识也可以作为考证的渠道。

总之，我觉得古书鉴定这门学问本来是跟校勘学相连的，甚至于就产生于校勘学，严格地说是校讎学，校讎包括校勘。应该说，是一种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服务的辅助性的科学，提供的辅助性材料越准确具体越好，便于学者使用。

今天就讲到这儿，既然是读书沙龙，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个互动交流。